

林口革命歷史回憶錄

林口
革命
歷史
回憶
錄



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

中共林口县委史志办公室编

目 录

序 言	1
革命历史回忆录	
李范五同志回忆录	2
田孟君同志回忆录	6
丁文礼同志回忆录	10
张锡昌同志回忆录	12
秦敬三同志回忆录	17
于洪典同志回忆录	21
张学眷同志回忆录	29
李春庵同志回忆录	35
王发启同志回忆录	39
蒋惠群同志回忆录	42
张玉林同志回忆录	51
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	
林口一六二支部調查資料	59
中国共产党林口县组织史资料 ·····76	
林口党的活动大事记	98
后 记	135

序 言

中共林口县委员会党史工作办公室，继《林口烈士》和《八女投江文史辑》党史资料出版后，又编纂印刷了《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奉献给广大读者。

林口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困难复杂的剿匪斗争，创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无数感人肺腑的历史篇章。今天，将其整理编写出来，以飨读者，对我们了解林口的历史，研究林口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林口革命历史回忆录》收集了李范五等十余位老同志的回忆资料，记述了林口建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不朽功勋；赞颂了抗日联军和剿匪战士的英雄事迹，是一部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邓小平同志说：“用革命的事蹟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建设家乡，改变家乡，以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奋发向上、努力进取，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把家乡建设成繁荣昌盛的乐园而奋斗。

中共林口县委员会党史工作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李范五同志回忆录

按：李范五同志，现年71岁。原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现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李范五同志在1936年2月以前，主持吉东特委工作。林口地下党的几个联络点均属当时特委领导。

1983年8月6日，李范五同志来林口回访，此间，县史志办就地下党等方面情况向他做了采访。事后依据采访录音整理了这篇回忆录。

一、关于田孟君在林口时的工作任务

1936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一），驻在牡丹江的吉东特委机关遭到破坏。2月4日，我在牡丹江处理和各县的联络关系问题，通知各县，特委遭到破坏，不要再来人，什么时候联系，以后听通知或者派人去联系。同时，我又派潘祥到勃利给县委书记孙靖海（即李成林）送信，告诉他立即转移。因孙靖海到牡丹江送过罗英。罗英被捕时，他还在旅店里，罗英知道孙靖海在勃利的住址，所以赶紧给他送信，要他躲开，避免发生意外。潘祥送信后，回到林口，在石印局住一个时期，然后到苏联去了。我把同各县的关系切断后，于2月5日早晨，和田孟君在桦林车站上车来到林口。当时我把田孟君安排到离林口街八里地的戴绍荣家，留她在那做一个联络员，以便我走以后，有什么事情，好通过她联系。交给她的联络任务是，让她同林口的石印局联系。

因我在海参崴要和这个石印局发生交通联系。这个石印局是联络密山和国际交通线，与勃利发生联系，也通过这里；同时我还让她找李福堂，为的是和部队的周保中发生联系，再就是和穆棱县委书记宋祥（即宋一夫——整理者注）联系。我2月6日到哈拉岗，7日到的半截河，晚上到红军哨所郝家屯，此屯住有七、八十户人家，离半截河很近，从南小站过界，不到一公里地。

田孟君在林口住两个多月。据戴绍荣老伴讲，她在戴家住四十多天，于四月下旬离开林口去海参崴的，她和李福堂一起去的。因李福堂代替田孟君的工作，让他回来作交通员。李福堂到海参崴后，住在另外的地方，我没有见到他；田孟君到我住的地方，呆了三天就去莫斯科了。我5月3日也离开了海参崴。

丁宝殿在密山时，石印局设在平阳镇，以后才搬到林口。特委被破坏后，我告诉他不要回牡丹江，就在林口听信。于忠有就是潘祥，瘸子，是同各县联络的交通员。佟双庆是国际交通员，家住半截河街东的一个屯。过界带不带人都从他家出发，从东岗绕过郝家屯，就从西北角进红军哨所，如走郝家屯，就从北面进红军哨所。

二、关于于化南的情况

我在海参崴见到了于化南（时间应在1936年2月至4月中间——整理者注）。后来，佟双庆送于化南到林口（在田孟君从林口走后），派他到林口来代替田孟君的工作，任务是搞联络。当时主要的联络对象，一个是周保中，一个是穆棱县委，一个是海参崴。我在海参崴见到他以前，他是饶河县委书记。1936年底，他离开林口后，到苏联

去了，和我在一起学习，但不是一个学校，学习完了以后，到延安又见到他了。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起从延安出发到沈阳的东北局，然后分配到佳木斯。1945年11月15日，我们到了勃利县，当时把于化南和刘兴亚二人留到勃利，我们17日到达了佳木斯。当时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铁路还是畅通的。因为孙荣久还没叛变，这段交通属于三江人民自治军的一部分。这段时间里，于化南曾到佳木斯去汇报好几次，主要汇报部队的工作情况，同时向我们要干部，韩义可能就是因为勃利要人才把他派去的。这时陈兴亚到孙荣久部队去了。

同年12月13日，勃利发生事变，孙荣久叛变了，第二天打了一天，并把派去的陈兴亚杀害了。当时于化南跟着马忠臣、王景坤和其他一些干部逃出来。牡丹江来了兵车，要走的部队就上了车，一起来到林口（12月15日左右）。兵车要往鸡西去，就把他们留在林口，住在苏军司令部里。张闻天、富振声等也在林口苏军司令部。张闻天把他们组织起来，决定在富振声的家乡——勃利建立一个根据地。指定富振声是地委书记，于化南是专员，王景坤是司令员，马忠臣是副团长，韩义是政治部主任。这个安排宣布以后，他们就奔往富振声的家乡，可是，还没到勃利，部队就从勃利撤下来了，走到半路上，又被埋伏的土匪袭击死伤一些人，剩下的人，子弹打光了，拿着空枪回到林口，到苏军司令部，把枪一交就都散了。富振声、于化南、王景坤、韩义这些负责人也都回来了，准备奔牡丹江去。一部分化装坐火车走，如王景坤、马忠臣等；另部分由于化南带李述等进山绕着走，他们到山里绕了几天，因没吃的又绕出来。结果在龙爪遇到了土匪就被抓住了，时间大概是1945年12月16日至18日之间（是1945年12月19日——编者注）。

当时土匪专门抓从关里来的老八路，于化南被捕后遭杀害了。有人说他里边穿的毛衣、毛裤还是在延安时织的，被认出来了才被杀害。

三、关于张闻天来林口的情况

1945年12月，勃利事变以后，张闻天、方强、黎侠等从牡丹江乘火车来林口。火车一进林口，土匪就往车上开枪，他们就感到不对。到林口后，知道了这个地方土匪收编后又叛变了。他们来到苏军司令部后，分成两部分，方强带一伙人（包括黎侠）坐火车，有苏军保护强行到佳木斯。张闻天当时回到牡丹江，以后到宁安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社会状况。1946年4月份，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铁路打通了，孙荣久也被抓了，他的部队被消灭了一部分，打散了一部分。谢文东、李华堂的匪队也基本被消灭，合江的局面打开了，同时也比较安全了。5月份，张闻天来到了佳木斯。

田孟君同志回忆录

按：田孟君，女，73岁，
已离休。离休前为北京经济
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她对1936年3——4月间
在林口地下交通站工作情况
的回忆整理如下。

1935年，我在宁安县负责妇女工作，5——6月间，吉东特委在牡丹江市建立，把我调到特委工作。地址在牡丹江市一个日本“料理馆”后院，是租的民房。后因环境变化怕出事，于当年7月份搬到牡丹江飞机场附近（当时叫兴安大街），因该处工棚子多，好隐蔽。对我们虽有利，但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时间久了会暴露目标，所以9月份又搬到兴隆画铺后院了。

特委建立后，书记是吴平（杨松），共产国际派来的。
8月份又调回共产国际，由李范五（李福德）任书记。

在吴平任书记时，李范五任组织部长，孟泾清任宣传部长，张林负责团的工作，我负责妇女工作兼穆棱一带的铁路赤色职工会工作。

吉东特委当时辖穆棱、宁安、密山、勃利、依兰、虎林、饶河等县。

1936年农历正月二十几，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其经过是：李延录被调去苏联后，李延平任四军军长。他派罗英（负责四军军需）上特委来，住在牡丹江一个旅馆。工作任务完成后，特委让他马上离开。当时有一条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到热闹的场所去自由活动，怕暴露目标。他不但没走，还到了戏院，结果被宣世贵（原是小白龙山林队，被我收编后为四军三团机枪射手，后又投日寇）发现，盯着跟踪到罗住的旅馆，又带来人将罗抓去。罗被抓去后叛变，领着人去抓张长德（设在宁安县大、小朱家屯的联络员），因张不在家，将其父母抓去，张得知后，便去自首，将父母换回来，随之张也叛变了，他领着人抓的孟泾清（孟被捕后，表现坚决，什么也不说，后被日本人扔到狗圈牺牲）。孟被捕后，李范五即派苏维民（田仲樵——我姐姐）去宁安，给周保中（五军军长，当时在宁安）和宁安县委送信，告诉吉东特委部分遭到破坏，要注意隐蔽，以及特委机关将立即转移密山等情况。

特委被破坏后，我便随李范五走了，我走前，把工作交给苏维民，当时她是抗联四军的。我们路经东京城的上马连河，在黄志山家住下。在这里看见了于忠友（现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而后路经林口，在一家旅馆住了一宿，便去密山县的平阳镇。这里的县委书记褚志远（现为沈阳市化工局副局长）也出事了，褚不在平阳，房东说：“他爱人要小产，去亲戚家了”。

又说：“密山宪兵队有一个翻译，同情抗联，经常来往，被日本人怀疑，县委怕出事就转移了”。

我们从平阳镇来到二人班，在佟双庆家见到了褚志远夫妇，共同商谈之后，李范五决定去四军，我暂住佟双庆家。四、五天后，李从四军回来，经研究决定他去苏联海参崴共

产国际，找吴平汇报特委被破坏情况。他临走时让我负责特委的联络工作，并向我布置三项任务：一是保持特委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二是保持特委和各县委的交通联系；三是等待共产国际对特委的指示。同时告诉我，国际交通员是佟双庆，特委和各县委的交通员是于忠友，因于是瘸子，他去不到的地方，可告诉四军、五军再通知各军告诉地方。最后研究我到哪里去的问题。去部队吧，因我怀孕不行；回八面通呢，因家乡都知道我出来革命，也不行；最后确定到林口接上关系后，可住在李范五的亲戚戴绍荣家。

1936年农历正月下旬（公历2月中旬——编者），李范五从二人班走后，我便从平阳镇上车来到林口，在原住的旅馆住一宿，第二天到当时的交通站——林口东街的刻字铺（石印局）见到丁宝殿（比我小三岁），我们原来就认识，是家乡人。我们用暗语接上关系后，他领我到里屋，又看到了于忠友（当时十八、九岁）。我把事情说明后，交通员于忠友当天买好干粮，就往勃利、依兰送信。我便去龙爪沟口住在戴绍荣家（是李范五的亲姑舅姐夫），我当时穿着姐姐换给我的古铜色棉袍，通过打听姓韩的才找到戴家。当时戴家刚娶儿媳妇，为掩护我将儿媳妇打发回奎山的娘家。因为敌人搜查，我白天隐蔽在秫秸垛内，晚上进屋。要上林口街，就得起早走，晚间才能回来。后来发现戴绍荣家的马架门前是马车路，来往的杂人多，长住在此，容易暴露目标。我向戴绍荣说明情况后，就派他去穆棱县委找李范五的弟弟李福堂（光复后牺牲在绥阳），让他把穆棱县委的同志给请来。戴走时我给写的信，缝在他棉袄里，可是未等穆棱县委来人，共产国际的交通员佟双庆来了。他传达指示，如果生孩子在戴家不便（因戴家没有小孩）要另找地方；要没有合适的地方，就将我的任务交给穆棱县委，共产国际不久

就会派人来。果然，穆棱县委宋祥（宋一夫）得信与李福堂就一同来了，但未到戴绍荣家，而到林口西街的戴绍祥家。我第二天去找他们，共同研究暂到戴绍祥家。可是没住几天，感到戴绍祥有长辈（李范五的姑舅大爷），长住打扰也不好，所以又和宋祥、李福堂研究，最后决定去苏联。于是我把工作向宋祥作了交待，他接收后，我于1936年4月下旬，离开了林口，经密山到二人班，又到了海参崴，见到了李范五和吴平。

从1935年5月（或6月）到特委，至1936年4月底离开林口到海参崴，共近一年的时间；其中在林口近二个月，即1936年3——4月。

（983年5月28日整理）

丁文礼同志回忆录

按：丁文礼同志（原名丁宝殿），住哈尔滨市。这是他 1936 年在林口街的吉东特委机关工作时的回忆。

1936 年农历正月下旬，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去共产国际（海参崴）之后，田孟君也于当年公历 4 月底去苏联了。这时，在苏联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的第三国际，派来个姓诵的，带着代表团的介绍信，与李福堂一起来找我。我看了介绍信后，便知他是负责特委工作的。经过商量，我这里原来的特委交通站变为特委机关，姓诵的是特委书记，化名李德生（后听李范五说真名叫于化南），我做秘书工作。印刷工人于安林，是我发展的党员，负责跑交通。还有一个姓赵的学徒后来到了部队。特委机关的地址，在林口东街宝安印刷局。当时的工作：一、办救国报和文件保管；二、派学员去苏联学习，对象是（1）在地方呆不下去的，（2）有培养前途的，（3）思想上动摇的。我送过一次，是从依兰派去的两名中学生，一男一女。因为当时北满和吉东在东北只这一条通路，我送到密山县界，他们再派人接去。秋天往后派学生过境就不行了，因国境上日寇增卡子了；三是领导宁安、勃利、穆棱、依兰、密山等县委的地下

工作，主要是接待上级来人；四是发送翻印的巴黎救国报和别的文件。

当时林口设立三个交通联络点，东街有银匠铺、修表铺两处，西街有个鲜货床子。于化南在石印局（林口东街宝安印刷局）伪装写字先生。1936年冬，于化南带于安林和小赵到部队去了，印刷局因刘广田（穆棱县委书记）被捕就放弃了。1936年底，在林口的特委机关也因刘被捕而撤离了。我在于化南没走之前走的，到勃利县去建点，参加了勃利县委，和易恩波接上了头（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勃利县公署职员）。

1937年1月，我调到部队后，就成立省委了，在省委秘书处工作，省委书记是宋一夫。

（1983年5月27日整理）

张锡昌同志回忆录

按：抗联战士张锡昌同志，曾是我县解放初期党政军的负责人，奉命接收林口，并担任林口苏军司令部副司令，现年65岁，已离休，离休前任嫩江地区林业管理局长，嫩江行署公署顾问。

1945年8月初，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苏联红军将要对日本宣战。当时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伯力郊区的集训队（即第八十八特别旅），已经开始行动，按照计划将要空投到敌人的后方去。我们这个小组要带着无线电台到林口，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可是，形势发展很快，苏联对日本宣战后，进攻神速，日本侵略者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上级改变了原计划。

8月12日，由张寿筭（李兆麟）同志带领一大批中国和朝鲜干部，各三百余人，乘火车经绥芬河到了牡丹江。另一路由周保中同志带领，乘飞机到长春。冯仲云带一路去沈阳。我们在牡丹江休整二十天，以后分配到指定地点。

9月初，我和赵海涛、于一秀三人，由一位苏军上校军官带领，乘吉普车来到了林口苏军司令部。上校向苏军司令

介绍了我们三人来的目的是接收林口，我担任苏军司令部的副司令，赵、于二人是协助我工作的。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们都穿着苏军军装，我是中尉、赵是少尉、于是上士。我们的任务，一是协助红军维持地方秩序，宣传中苏友好；二是寻找地下党的关系；三是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四是建立群众组织——民主大同盟。

在林口苏军司令部里，我们三人组成了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于一秀、赵海涛临来时我们在伯力由八十八旅党委发展的新党员。那时就确定我到林口后，负责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我们在林口期间（大约在10月）又发展了一名党员，就是姚金呈，后来当了我们的公安局长，当时我们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许多人的正统观念很强，就知道有个蒋介石和中央军，但对他们的底细根本不了解。那时，在林口街上有个国民党部住在铁道北，在剧院东边；还有个国民党的公安局，在铁道南，苏军司令部的东边；地方上还有个维持会，它是应酬苏联红军生活的，实际上也是倾向国民党的。在林口街的四周，还有大批的土匪武装，自称是中央军，如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孙小辫）等，他们的装备好（都是从日本军仓库搞去的）嚣张一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便在群众中宣传时事与形势，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时我们司令部住在铁路南的一个小楼上（今外贸公司处）。这时有一个叫阎兴亚（阎玉川）的人来找我们，说他是地下党员，接着，有回景才、王裕民、周某（麻脸）、蔡兴坤也一起来找我们。他们是听了赵海涛、于一秀的宣传以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才来找的，并说他们是一个党支部的，回是文书，又说头几天还看着阙玉坤（林口地下党负责人）了。当

时由于没人证明他们的政治身份，经过研究，决定先分配他们搞民主大同盟工作。

10月初，我们让阎兴亚他们七、八个人去组织大同盟，机关设在铁路北的一个小楼里，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纲领，宣传中苏友好。他们工作了半个月以后，有一天维持会的人领着两个喝醉了酒的苏军士兵，来到大同盟，说这些人是土匪，便把大同盟的门窗给砸了，军毯用马刀也给砍了，把大同盟的五、六个人也给抓去关起来了。第二天我们找苏军司令，他同意放出来。当我们去放他们出来时，他们已经从自己掏的洞逃出来了，以后苏军班长就此事还向我们道了歉。阎兴亚后来敲诈勒索群众，私印我的名片到处闯祸，还抽大烟，被我们发觉后，为争取民心，严明纪律，便把他枪毙了。从此，大同盟的活动就结束了。这以后，形势就更乱了，动起真刀真枪了。

不久，由牡丹江苏军总司令部派刘殿元同志，作为牡丹江司令部的特派员协助我们工作，同时还派来刘汉武、米万斗、岳金龙等四、五个人，带有金光侠同志的信，让我安排他们的工作。刘汉武是讲武堂（张学良为培养东北军军官建立的军官学校）出身，让他当了武装队长，搞扩建武装。当时，我们对参加武装的人员审查很严，主要是在伪满劳工中吸收。几天以后，武装队就发展到十余人。当时我们没有武器，只好在地方上收缴日本人丢下的。

10的一天，刘汉武带二十余人的武装队去麻山矿区扩建武装，由于走漏了消息，他们在接近麻山时，被国民党的公安局长贾日元派去的武装包围，这一仗打的很激烈，刘汉武等十余位同志牺牲了，米万斗同志奋力突围出来，向我作了报告，我们坐火车到牡丹江红军总司令部汇报，司令部派了一个搞肃反的苏军上尉同我们一起坐火车回来。在桦林停